

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

倪延年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6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倪延年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6

ISBN 7—81050—945—4

I. 中... II. 倪... III. 报刊—文化史—中国—古代 IV. G21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427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五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2 字数:33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定价:25.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发行科调换,电话:025—3792327)

致本书作者的信

方汉奇*

延年同志：

2月6日信及《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书稿均已收到。书稿粗读一过，觉得很好。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部分，论述古代报纸的起源，不囿于旧说，颇有新意，而且自成一家言。古代报纸的实物，今已不存，对她的起源有歧议，是正常的。不妨各说并存，让学者择善而从。您近年从事新闻史研究，成果迭出，时有新的创获，可喜可贺。《淮南子》有云：“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增辉”。即以为颂，并祝

撰安！

方汉奇

2001.2.12.

（来信要我为大作的出版“写一句话”，以这封信充抵，如何？）

* 方汉奇先生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序

江乃武*

我和延年同志相识已十多年,虽然分处南北,却曾多次晤面长谈,直接或间接地共过一些事,时有书信往来。就我所知,在治学方面,他勤奋好学,勇于钻研,文思敏捷,每有新见,论著颇丰。已先后出版了《期刊学概论》、《图书馆期刊工作规范化研究》等十多种著作。从论文说,他乃是当今连续性出版物管理方面多产与核心作者之一。他的这些论著都是起早贪黑地利用工作余暇写成的,耕耘之辛勤令人感佩。尤为可贵的是,他没囿于最初从事的连续性出版物管理方面的研究,而是积极地向有关方面探索、拓展,曾从事过“图书馆学概论”、“情报用户心理学”、“文献检索”等课程的教学;前几年又出版了《知识传播学》一书。近年进军新闻学领域,已出了一些成果,在继《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之后,又新著《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最近已将书稿撰成,并嘱我作序。

我国古代报纸始于唐代,有文献和实物为证,但报纸之非纸形态起源于何时,则几十年来诸说不一,主张源于上古、周、春秋、秦、汉者皆有之。延年对此持“战国说”,他从新闻传播的基本条件出发,详细分析了《春秋》的名与实,引用一些有关的文献为证,认为《春秋》是“我国古代报刊的萌芽”,并由此逐步梳理到清末。和以唐朝为中心而

* 江乃武先生退休前任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并先后担任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科技情报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期刊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现任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期刊专业委员会顾问。

详后略前的书不同，本书对唐以前情况也叙述论证较为详细。这样既能使读者窥发展之全貌，又于澄清起源问题亦有益，是对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又一开拓。

延年在这部著作中引用了丰富的资料，有历史文献，也有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是全文引用，较多的是有关片段；某些是引而不论，有些则是引后予以评述，引论交汇。例如关于“进奏院状报”的称谓，书中即引用了 50 条文献，最后以“诸名指的是同一事物，但有其流变关系和用于不同场合”概括作结，于纷繁中理出了头绪，引导读者认识由分到总。

作者在书中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见解，这在各章节都有所见。例如，一般认为元代无邸报，确实也没有发现有关的文献和实物。延年依据元代具有较为完整发达的驿传制度，曾颁布过严防传播消息的禁令，存在着文字隔阂和高压政策，有民间报纸“小本”的记载等，认为“元代有邸报，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足够的史料”。这一论说虽然缺乏文献和实物的支持，但推断是合理的。有见解是好事，但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认识。其实，不同见解乃是统一认识的前奏，类似《吴医汇讲》究竟是不是连续出版物等等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在有更多的人各抒己见地讨论后，一定会有个圆满的解决。

报刊发展史当然主要是史的论述，但它毕竟是和连续性出版物管理的现实相关联的。它使我们晓得所管理的对象之产生、演化的脉络，知道它兴旺发达的原因和动向，等等。做连续性出版物管理工作和研究的人，应当知道连续性出版物各个子类型的发展史。即使是从出版与新闻学角度阐述的报刊史也是必要的，从古知今，“古为今用”，希望同志们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2001 年 2 月 16 日

目 录

致本书作者的信	方汉奇
序	江乃武
第一章 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和萌芽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战国说”	7
第二章 秦汉时期报刊的发展	21
第一节 秦统一全国前后的报刊	21
第二节 两汉时期报刊的发展	29
第三章 魏晋隋唐时期的报刊	39
第一节 魏晋时期报刊的发展	39
第二节 隋唐时期报刊的发展	42
第四章 五代及宋朝的报刊	59
第一节 五代时期报刊的遗迹	59
第二节 宋朝官报“进奏院状报”的形成和发展	63
第三节 宋朝民营报纸“小报”的产生与发展	88
第五章 元代及明朝的报刊	111
第一节 元代报刊的概况	111
第二节 明代邸报的发展和嬗变	119
第三节 明代的塘报及其影响	174
第四节 明代民间报纸的发展	191
第六章 清初至清中叶的报刊	210
第一节 清初至清中叶的朝廷邸报	210

第二节	清初的塘报及提塘职能的转变·····	224
第三节	清初至清中叶的《京报》·····	233
第四节	清初至清中叶的其他报刊·····	253
第七章	清中叶至清末的报刊·····	264
第一节	清中叶至清末的封建官报·····	265
第二节	清中叶至清末的外人在华报刊·····	285
第三节	清中叶至清末的政党团体报刊·····	301
第四节	清中叶至清末的其他报刊·····	343
后记	·····	370

第一章 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和萌芽

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萌芽、发展到成形的历史进程及其所蕴涵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学问。它必须以历史事实(文献记载和文物考证)为依据,并且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合理的推理,从而力求对中国古代报刊的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古代报刊发展的历史,勾勒出一个大体准确可信的轮廓,并且能从中获得某些规律性的启示,以供后来报刊研究参考。要研究中国古代报刊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首要前提是要能科学地确定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即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的历史起点,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的基本问题。

确切地说,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报刊发展历程相仿,中国古代的报和刊,倘若按照现时的标准,其界限似乎是模糊不清的,既无所谓报,也无所谓刊。本书既为叙述的方便,也为了和前已出版的拙作《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在题名上相衔接,故以“报刊”合称之。

第一节 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研究现状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有新闻事业的国家。^[1]这已经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但究竟在什么时间(历史时期或朝代)出现了中国古代报刊的初始性萌芽,也就是说把中国古代报刊的历史起源确定在哪一个历史时期或朝代,海内外学术界人士的看法却不很一致,有些认识甚至相距很大,而且似乎是各有依据和理由。归纳起来,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周朝说”

该种观点认定中国在周朝时期即出现了古代报刊的萌芽,中国

古代报刊起源的时间点应定在周朝，距今约近 3000 年。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主要是外国学者，有日本人，也有美国人，还有法国人。近代报界巨子梁启超及秦理斋等人，也持有大致相近的观点。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前后，日本新闻史研究者后藤武男在其所著的《新闻纸研究》一书中提出：“原始新闻纸的发行，中国比罗马还早，就是比着于西历纪元前 60 年顷罗马所发行的两纸还早。较此早 900 余年前的同时，已经有所谓‘京报’这种新闻纸刊行”。^{〔2〕}据文献记载，公元前 60 年，凯撒大帝在罗马执政后，他的第一个法令便是每天编辑出版（公布）元老院和平民会议的记录。这就是被国外学术界称为西方最早报纸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它曾用过多个名称，如 Acta Senatus、Acta Populi、Acta Popula 及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 等，其内容涉及政治事务、皇家新闻、公众关心的重要新闻等方面。具体做法是把这些内容书写在涂有石膏的白色书板上，陈列于公共场所，以供居民观看了解，同时还雇佣许多抄写者把内容抄写成副本，各处张贴。^{〔3〕}并且还把写有新闻内容的涂有石膏的白色书板，通过驿道传送到各省，从而扩大对上述新闻内容的传播范围。后藤武男之所以称“罗马所发行的两纸”，可能是源于《每日纪闻》的内容主要是来自于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会议和平民会议；也可能是当时的《每日纪闻》，用略有不同的名称来分别发布元老院会议和平民会议产生的新闻，即同一名称的不同内容版别。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

与后藤武男同时的日本新闻研究者杉村广太郎在其所著的《新闻概论》一书中认为：“‘京报’是官报的一类，从周朝就有，一直继续到清朝的灭亡。若是始自周代，则至今约三千年了，无论怎样，可以说是最古的新闻纸了”。^{〔4〕}

另外，据我国著名的新闻事业史研究者胡道静先生在其《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中介绍，曾经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前身）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教授（其英文名字为 Roswell Sessoms Britton）也持有与两位日本新闻史研究者相近的观点。他把一种据说在周朝就已经出现的报纸称为“公报”，并且进一步认为这种

被称为“公报”的报纸创办于公元前 620 年,即周襄王三十二年。^[5]照此推算,中国古代报刊出现萌芽至今已有 2620 年的历史了。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事实依据。

二、“汉朝说”

这种观点认为在中国汉朝时期,中国古代报刊的萌芽就已经出现。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学者戈公振先生。同时他也是在学术界第一个提出“中国古代报刊产生于汉朝”观点的学者。

戈公振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第一部系统叙述中国报刊历史的《中国报学史》中,从《说文》一书对“邸”字的解释,《汉书》对“邸”这一事物的“注”,《史记·封禅书》中对“邸”的记载以及《西汉会要》对“邸”这一机构的性质、功能的说明等方面,率先提出“汉代即有邸报”的结论。尽管该书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第二节的标题仍为“汉有‘邸报’乎”,但从行文的内容上看,结论却是肯定的。他认为:邸,“属国舍也”。“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由此进一步指出:“邸之制度,由来旧矣。邸中传抄一切诏令章奏以报于诸侯,谓之‘邸报’,犹今日传达消息之各省驻京代表办事处也”。他根据《西汉会要》中“大鸿胪属官有郡邸长丞”的记载以及对“邸”这一机构性质所作的注疏,明确指出:“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6]《中国报学史》写成于 1926 年 6 月,出版于 1927 年 11 月。尔后,他又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一文中明确指出:“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其驻在京师之属官,皆有‘邸报’之发行”。该文载 1927 年《国闻周报》4 卷 5 期。到了 1930 年,他又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指出:“汉因幅员广大之故,不得不刊行一种传布朝廷大事要政之官报。同时驻京各地诸侯,亦设邸府京师,沟通朝廷消息,遂生邸报”。^[7]

在戈公振先生提出“汉朝说”之后,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吴晓芝的《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以及管翼贤的《新闻学集成》等著作

中，都采纳了戈公振先生的观点，而储玉坤在其所著的《现代新闻学概论》中，则进一步明确认为“我国自汉唐以来，即有邸报”，^{〔8〕}上述著作出版的时间已在本世纪40年代末。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著名的新闻史研究学者曾虚白在其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一书中，仍然采用了戈公振先生的“汉朝说”观点，认为“因为武帝之武功鼎盛，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9〕}

三、“东晋说”

该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东晋时期，中国古代报刊就已经出现。提出这一观点的是一位姓氏不详的外国学者。

1982年5月，由人民日报社创刊的《新闻业务》月刊改名而来的《新闻战线》，在1982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范先聿翻译、但没有署原文作者姓氏的文章《传播技术的演变》，文章认为：“公元363年，在中国开始出现邸报，这是历史上最悠久的杂志，一直延续到近代。”该篇文章的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民主新闻工作者》上。这一观点明确无误地把中国开始出现“邸报”的时间，确定在公元363年，即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同时，把“邸报”又首次说成“杂志”，即把古代“报纸”和“杂志”的概念合一，似乎是一大进步。但因文中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作出这一结论，所以无法验证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只得有待于出现有关史料来验证了。

四、“唐朝说”

该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报刊产生于唐朝。在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方汉奇先生。

1981年6月，他在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第一章《中国早期的报纸》中率先明确提出：“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大约起始于唐朝，是封建王朝的政府机关报。因为由‘邸吏’负责传发，所以称为‘邸报’”；“邸报的内容主要是：一、皇帝的诏书、命令和皇帝的起居言行；二、封建王朝的法令、公报；三、王室的动态；四、关于封建政府

官员的升黜、任免、赏罚、褒奖、贬斥等方面的消息；五、各级臣僚的章奏疏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给皇帝的工作报告、各地驻军将领的战报、封建言官对朝廷措施的规谏、对失职官吏的弹劾等）和皇帝的批语，没有一般的新闻和言论”；“邸报只在封建统治机构内部发行，它的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级政府官吏为主，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豪绅钜贾往往也可以设法看到它的抄件，一般的庶民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10〕}在这里，方汉奇先生对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作了明确的叙述，包括它的名称、名称来源、起始时间、性质、内容、传播范围和传播的对象等方面，是国内学者对“邸报”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论述。尔后他又在与陈业劭、张之华等人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再次肯定了这一观点。

到1992年9月，由方汉奇先生任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出版。在由他亲自执笔著作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中国早期的报纸，始见于唐代”；“出现于唐代的最早的报纸，是地方诸道和各藩镇派驻朝廷的邸吏，向地方传发的一种报状”；“这种报状是邸吏们根据朝廷‘条布于外’或‘牒布于外’的文件和信息，以及自己采集到的各种情报，先于正式公文，传发于地方的”；“它们是封建地方军政官员获取朝廷信息的重要新闻传播媒介。它们的发报活动，受地方当局的指挥，因而归属于地方，不具有封建中央政府官报的性质”；“由诸道邸吏向地方传发的时事报状，其起始时间，大约不晚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即公元8世纪初”；“唐代的报状，是一种从官文书游离出来的原始状态的报纸。……这种报状虽然还残留有某些官文书的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反映了由官文书向早期官报转化的历史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十分接近于16世纪诞生于欧洲的‘新闻信’。和后者一样，都是现代报纸的原始状态，但早于后者约800年”；“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这是古代人对封建官报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11〕}

和方汉奇先生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新闻史研究著作，据笔者

所见主要有：

我国台湾的新闻史研究学者朱传誉先生所著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他在其中的《唐代报纸研究》一文中认为：〔(唐)裴庭裕所撰《东观奏记》和(唐)锺谿所撰《前定录》〕“这两篇文字中所提到的‘报状’一词，显然是报道马植升官的事，自然可当作邸报看待。当时邸报的内容主要是官吏的任免，如《旧唐书·唐本纪》记唐明宗(后唐)长兴三年，史馆奏：‘宣宗以下四庙未有实录，请下两浙荆湖购募野史及除日报状。从之。’除目就是官吏的任命，‘除日报状’和前述‘报状’同义。”并且认为“唐代的进奏院，不但是最早的报馆，还是最早的钱庄”。〔12〕

黄卓明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认为：“《李师古传》提到的‘得邸吏状’，《全唐诗话》提到的‘客曰邸报’，《东观奏记》提到的‘报状至蜀’，显然都指的是‘进奏院报状’。因为它是由进奏院抄传的，进奏院曾被称作‘邸’，所以在有的记载中使用‘邸吏状’或‘邸报’，而不像收入《桂苑笔耕集》的表状那样写明‘臣得进奏院状报’。看起来名称似不一致，实际上则属于同一事物，这应是明确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的原始形态报纸应始见于唐代。而且很可能是在‘盛唐’的历史条件下，创始于开元年间。又基于开元以后藩镇制度盛行的历史条件，形成为第一级的‘报状’和第二级的‘进奏院状报’。两者的内容一致，这是唐代报纸的一个特点。”〔13〕

由十四所高等院校合编、王洪祥任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认为：“‘贞观之治’之后，唐玄宗任用贤相，整顿弊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人口增加，经济繁荣，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之治’。就在这‘开元盛世’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手写报纸——报状”；“唐代又一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进奏院状。唐朝的进奏院是在汉朝的‘邸’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进奏官可以向中央政府查询一些行政事务，参与朝廷的盛典活动和将京师消息通报给所属地区的行政长官。……这便出现了进奏官根据报状抄写的‘进奏院状’”；“如果说‘报状’是唐代的一级传播媒介，‘进奏院状’为二级传播媒介，那么，

观察使牒(报)就属第三级传播媒介。唐代把全国划分为十道,道的最高军政长官是节度使,在他得到皇帝诏令或进奏官的状报后,往往通过其副职观察使,向下属官员发出牒报”。^[14]

除了上述介绍的著作外,还有诸如尹韵公所著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以及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等,也都大抵是持“唐朝说”观点。

上面我们初步回顾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时间的不同观点,由于笔者所见文献有限,可能还有一些观点未能列出,只好待以后来补充,或请学术界同人方家指正了。

第二节 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战国说”

前面我们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研究上的不同观点和各自的论据,应该说都有其相对合理的部分,否则,作为一个对新闻史有一定研究和思考的学者,绝不会凭空猜测或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种观点。其不能引人信服的原因,主要是缺少确凿可信的实物和文献佐证。

一、关于中国古代报刊“起源”含义的基本认识

中国古代的报刊到底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很难一时有确凿可信结论的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 是对“起源”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差异。

“起源”只是开始出现,甚至只是有一点点萌芽,有一点后来发展成事实的迹象,而不是后来已经发生的事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上对“起源”一词的解释是:(1)开始发生:秦腔〔起源〕于陕西说,(2)事物发生的根源:生命的〔起源〕。^[15]这就是说,“起源”一词的本义是“开始发生”、“事物发生的根源”,即指事物刚刚出现时的一种现象;是事物发生到形成的起点,而不是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结果。从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到中国古代报刊的“形成”应当说在表现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异。所谓“形成”,是指“通过发展变化而成为具有某种

特点的事物,或者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16]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事物达到“形成”的发展水平,一定要“成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受到社会较一致的认可。从“起源”到“形成”再到“成熟”,这是一般事物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成熟”则必须达到“(1)植物的果实等完全长成,泛指生物体发育到完备的阶段。(2)发展到完善的程度”^[17]。由此可见,“成熟”的状态水平和“起源”的状态水平有更为悬殊的差距。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把“起源”、“形成”和“成熟”的状态水平引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为科学、客观地确定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提供一个较为实际的理论范式。“起源”就是“刚刚开始”,“事物发生的根源”,而不是也不应要求中国古代报刊在“起源”阶段就达到明显地表现为“具有某种特点的事物”,或“出现某种情形或局面”的“形成”阶段的状态水平。我们都公认长江起源于唐古拉山的某一山泉涌出之处,但假如到实地一看,那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而已。在这股细流边上,丝毫感受不到浩浩长江的风范和影子。但世人仍然不否认长江起源于斯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点,应该定在它刚刚出现萌芽的那个时间点上,而不能定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某种特点事物”的后来的某一时间点。

2. 是对中国古代报刊起源时的“形态”理解上有较大的差异。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生物体外部的形状。相当多的新闻史研究学者认定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唐代,甚至认定是在唐朝“开元盛世”时期,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手写报纸——“报状”。毫无疑问,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我们认为这“报状”已经是在从“起源”以后,发展了较长时间到达“形成”状态水平的结果,而不是“起源”时的水平。这是指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历程中内容“形态”上的发展演进。

“形态”的更重要的方面是指中国古代报刊的外观。究竟中国古代报刊在“起源”时应当具有什么样子,即达到什么水平的“外观形态”,学术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作过系统的思考和探讨。应当明确,

中国古代报刊的“外观形态”是随着人类自身的完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化的。在纸张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报刊不可能出现以纸张为新闻信息载体的物质外观形态,这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在纸张产生之前,我们的先人是否曾经利用过其他物质材料,作为记录传播新闻信息的媒介呢?假如用了其他材料,记录有新闻信息并且传播给别人。这记录有新闻信息的“其他”材料,即新闻信息荷载于其他物质材料如木牍、竹简等形成的用于传播新闻信息的物体,能否看成是中国古代报刊的萌芽呢?产生这一萌芽的时间点能否确定为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点呢?我们的观点是肯定的。因为假如硬要认定只有产生纸质材料的中国古代报刊才能作为中国古代报刊的起源,那么,剩下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古代报刊问题,而且还可延伸到对现在“网上报刊”的认定,即仅出版网络版、不出版纸质版的报刊算不算报刊。因为光盘、网络和竹简、木牍一样,都不是以纸张为载体,而且光盘和网络版报刊,甚至信息存贮形式都不是文字形式了。

二、关于中国古代报刊起源于“战国”之我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昭示我们,对世界万事万物,应当采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去认识和研究。正如方汉奇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报纸或称新闻纸,是一种以报道新闻揭载评论为主,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严格地说来,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但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全意义的报纸,也并不是突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经历了一定的过程,逐步地孕育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这一过程十分悠久而漫长。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萌芽;早在中古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的雏形。尽管和现代的报纸相比,它们还比较原始,不够完善,但毕竟反映了中国报纸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应该认真地加以考查的”。^{〔18〕}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报刊起源的认定上,只要具备以下几个基